

「天馬出蒲梢」 ——漢宛之戰再思

周天宇

柏林自由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

前 104 年與前 102 年兩次漢宛戰爭之始末，前人諸說尚未盡備。大宛拒絕向漢朝輸出善馬引起雙方外交衝突，導致漢使被殺，成為戰爭的導火索。而漢兩伐大宛僅獲善馬三十匹的戰果歷來頗受爭議。以此為出發點，本文結合史料與考古材料認為，大宛的拒絕實際是由於「宛善馬」並非原產自大宛本土，而是從外域引進後存蓄，且數量有限。大宛作為「土著」的重商邦國，善馬是其與鄰國中轉貿易的商品，而輸出善馬除獲得經濟利益，還可能受其與周邊諸「行國」地緣政治關係的影響，成為大宛平衡外交的工具，故大宛不會允許漢朝大量索取其進口良馬資源。本文同時認為大宛引進之「善馬」的原產地實為米底—帕提亞之傳統良馬產區，並推測漢籍所載「蒲梢」、「撲挑」應是該地區在帕提亞語或原始粟特語中之地名相關詞「Parθaw(an)」在漢文史料中的對音遺存。

關鍵詞：天馬 大宛 蒲梢 撲挑 帕提亞

引言

太初元年（前 104）和太初三年（前 102），漢武帝（前 156–前 87，前 141–前 87 在位）遣將軍李廣利（約前二世紀–前 89）兩度西征伐宛，獲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歸漢，標誌著西漢的政治軍事影響首次進入塔里木盆地以西的中亞。這作為古代中外關係史的重要事件，歷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關注。因這場戰爭的直接目的是獲取大宛善馬，故人稱「天馬之戰」，不過這一稱號對這場漢宛之戰顯得「名不副實」，且戰爭背後的歷史經緯疑點尤多，筆者嘗試重新梳理，以就教於方家。

一、「天馬」之戰與善馬之數

漢宛之戰發生時，大宛善馬尚未得名「天馬」。其事最詳實的記載見《史記·大宛列傳》，細審史料，「善馬」出現 12 處：從張騫（前 175–前 114）初抵大宛所見「多善馬，馬汗血」，到後繼使者奏報武帝「宛有善馬」；從首次伐宛失敗武帝震怒「宛善馬絕不來」，到再次伐宛，「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從漢兵圍城、宛貴人誅王毋寡（前 101 年卒）「乃出其善馬」，最後到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兩次戰爭前後皆言「善馬」。而「天馬」僅見 4 處：一為張騫歸漢報告武帝大宛善馬「其先天馬子」，非專名；二為武帝「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三為貳師終獲宛馬歸漢，武帝更名烏孫馬為「西極馬」，才冠名大宛善馬為「天馬」；而第四處「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之語，¹《漢書·西域傳》繫此於漢所立宛王昧蔡（前 100 年卒）被殺，新王蟬封遣子侍漢，歲獻天馬一事之後。² 故大宛善馬號為「天馬」，應是二次伐宛獲善馬來之後，時在太初四年（前 101）春，武帝大悅作《天馬歌》。

1 散見於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36、3848、3852、3854–3856、3920。

2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九六上，〈西域傳〉，頁 3895。

這場漢宛之戰的動因和目的，前輩學者論述頗豐，有：改良馬種說；³ 充實戰馬說；⁴ 經略西域說；⁵ 圖制匈奴說；⁶ 袒護外戚說；⁷ 禮儀御馬說；⁸ 長生求仙說；⁹ 開通商路說。¹⁰ 諸說¹¹ 從軍事、政治、經濟、信仰、禮儀各方面頗為深入地分析了因果與目的，但尚未盡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首先，均以大宛多善馬為出發點，而對漢宛之戰前後歷史邏輯梳理尚不夠清晰；其次，諸說均以漢為中心和視角來考證分析，忽略了大宛一方的史情線索；第三，均依靠文字史料，尚乏考古材料佐證。筆者嘗試從此三點再思漢宛之戰。

貳師將軍兩度西征，往來四歲，在西漢軍事史上規模空前。雖當時對匈奴戰事不利，武帝仍決意再次伐宛，發五十餘校尉、六萬餘人、三萬餘匹馬，「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梳理史料，戰爭因果之疑點值得注意：為求馬出兵以至「天下騷動」，¹² 戰果幾何？

《史記·大宛列傳》載漢軍破外城圍中城後，大宛貴人謀劃降漢

-
- 3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77。
 - 4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8；邢義田：〈漢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檢討〉，《食貨月刊》第2卷第9期（1972年），頁34；N.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3。
 - 5 張維華：《漢史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頁342；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81；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42；郝樹聲：〈淺論李廣利伐大宛的功過是非〉，《甘肅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頁99；胡岩濤：〈論漢武帝征討大宛國的緣由與影響〉，《秦漢研究》第9輯（2015年），頁291。
 - 6 林劍鳴：《秦漢史》，頁442；郝樹聲：〈淺論李廣利伐大宛的功過是非〉，頁99；高榮：〈論漢武帝「圖制匈奴」戰略與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頁5-8。
 - 7 邢義田：〈漢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檢討〉，頁33。
 - 8 N.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233, footnote 60.
 - 9 A. Waley, "The Heavenly Horses of Ferghana," *History Today* 5.2 (1955): 102；張維華：《漢史論集》，頁344-355。
 - 10 松田壽男（Matsuda Hisao）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頁249。
 - 11 邢義田、高榮已總結諸說，筆者有更補。
 - 12 以上均見《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3854。

「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願「盡出善馬，恣所取」。最終「〔漢軍〕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¹³《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同。《漢紀》：大宛「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¹⁴後續《史記》載「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¹⁵《漢書》：「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¹⁶《漢紀》：「還玉門關（死）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¹⁷可見漢軍拔宛歸漢再經鹽水流沙，馬匹耗損巨大。《漢書·天文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亦證。¹⁸由史料可見，李廣利入玉門時整軍尚存之馬——包括二次伐宛徵發的三萬餘和破宛所獲的三千餘——總共僅剩千餘匹。那麼其中武帝萬里征伐求取的善馬又佔多少？文獻亦有痕跡。

雖伐宛之戰後，西域小國紛紛遣子弟隨軍入獻為質，一定程度上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武帝還頗為滿意嘉獎軍功以至「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¹⁹但實際上，這一是為了平抑朝野對二度伐宛的異議（武帝曾「案言伐宛尤不便者」²⁰），二是掩飾伐宛初衷與戰果懸殊引起的異議。武帝時批評之聲暫隱，昭帝（前 94– 前 74，前 87– 前 74 在位）時隨即有怨：

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心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²¹

13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55–3856。

14 荀悅、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孝武皇帝紀卷五第十四〉，頁 243。

15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56–3857。

16 《漢書》，卷六一，〈張騫李廣利傳〉，頁 2703。

17 荀悅、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五第十四〉，頁 243–244；「死」、「數」二字衍，見「校勘記」第八四、八五條，頁 255。

18 《漢書》，卷二六，〈天文志〉，頁 1306。

19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57。

20 同上注，頁 3854。

21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501。

元帝（前 75– 前 33，前 48– 前 33 在位）時，劉向（前 77– 前 6）的抨擊更為激烈：「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²² 可見時人已頗不滿於所獲善馬太少。劉向明言的「駿馬三十匹」，雖未必實數，但應非信口而取。隨著西漢列四郡，從郡到都尉到置 / 亭，形成了一套嚴格成熟的名籍制度，不僅包括吏卒名籍，亦包括馬名籍。²³ 懸泉漢簡明載有出入存蓄馬匹情況的內容，學者據此估算懸泉置配備傳馬少者 20 餘、多者 50 餘，各時期變化較大。²⁴ 那麼「三十匹」²⁵ 或來自漢軍在大宛擇善馬時的當場記錄，或得自軍入玉門造冊登記的數目，²⁶ 且專為善馬出師，歸漢途中必定特加看護尤防死傷，前後計數可能相差不大。以取善馬為名遠征，何以成本如此高昂最終僅得善馬三十匹？還需整體梳理西漢求馬與漢宛之戰前後的史事與邏輯。

張騫鑿空，第一個抵達的中亞國家即大宛，宛善馬從此給張

22 《漢書》，卷七〇，〈傳常鄭甘陳段傳〉，頁 3017–3018。

23 例如懸泉漢簡 I90DXT0114 ① :90B+175B 之「傳馬名籍」、II90DXT0114 ④ :229 之「傳馬名籍一編」等。見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懸泉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9 年），頁 190，及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簡牘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懸泉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23 年），頁 217；永田英正（Nagata Hidemasa）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居延漢簡存 203.39 號簡「口馬名籍」，見頁 56；出入關人員及其隨行馬匹車輛均詳細登記，見頁 240–241、254；馬匹所有權，如驛馬、傳馬等官方馬匹及屬於個人的私馬均有區分，見頁 153。

24 郝樹聲、張德芳著：《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34。

25 上引《漢紀》「十匹」恐誤。《漢紀》行文多概括且數字多有脫衍訛誤，見荀悅、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孝武皇帝紀卷五第十四〉，頁 255，多條「校勘記」。

26 「玉門關位置、設關時間、隸屬郡治」歷來爭議頗多，本文不詳論，但作為河西至西域邊塞亭鄣之行政機構的「玉門都尉」，有漢簡佐證，如敦 14 新獲第 3 簡「酒泉玉門都尉護眾侯畸兼行丞事」，見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收入氏著：《夏鼐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中冊，頁 95–101；又，按前輩所考酒泉最早置郡幾無疑義，一般認為在元鼎六年（前 111），見郝樹聲：〈漢河西四郡設置年代考辨（續）〉，《開發研究》1997 年第 3 期，頁 59–60。因而或可推測簡牘所見的這套完備的馬匹登記制度早於太初（前 104– 前 101）時已設並漸趨成熟，故貳師軍入玉門時應有人馬數量統計記錄。

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歸漢後即奏稟武帝「多善馬」。張騫之後遣使數輩，漢使又數次向武帝進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²⁷ 可見善馬對西漢來說是大宛在西域諸國中的鮮明標籤。適逢漢地戰馬緊缺，²⁸ 武帝聽聞後甘心求馬，「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²⁹ 漢廷求馬態度著實懇切，贈賜亦甚豐厚，但卻因一場大宛宮廷外交衝突，漢使不僅未能完成使命還被遮殺奪財，這一導火索繼而直接促使西漢出兵拔宛。³⁰ 這場外交衝突又是因何而起？

與先前漢使匯報的「匿不肯與漢使」情況一樣，此次重金厚賜請大宛善馬，仍遭拒絕，大宛依舊「不肯與漢使」。〈大宛列傳〉中的拒絕理由有三，一為漢地絕遠、道死過半，漢「安能致大軍乎」；二為「貳師馬，宛寶馬也」；段首還提到一條背景因素即「宛國饒漢物」。³¹ 其潛在邏輯為：(1) 此時大宛已充斥各色漢物，厚賜不足為奇；(2) 善馬珍貴為國寶，大宛認為以寶馬換漢物的交易不值；(3) 即使拒絕漢使也沒有漢軍報復風險，漢「無奈我何」。〈大宛列傳〉的這條邏輯鏈或是司馬遷基於所持材料和個人理解而「復原」的，細查則值得推敲：(1) 大宛對漢物已無興趣，遮殺漢使卻仍「取其財物」；(2) 大宛善馬究竟如何「寶」貴而需屢次「匿」於漢使；(3) 大宛欲拒交易，先評估軍事報復風險，似乎這是其對外交往的首要考慮，而當庭拒絕漢使引發外交摩擦則是次要。筆者認為，(2) 是揭開種種疑問的切入點。

27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52。

28 「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言元封（前 110– 前 105）年間事。見《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3558。

29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52。

30 張維華：《漢史論集》，頁 342；胡岩濤：〈論漢武帝征討大宛國的緣由與影響〉，頁 290 等。

31 均見於《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52。

二、多馬之國與宛馬之疑

漢軍拔宛後「恣所取」之善馬數量僅三十匹，似乎當時大宛擁有的善馬數量並不多。而大宛屢次「匿不肯與漢使」進一步暗示即使伐宛戰爭前，大宛也並未存蓄大量善馬。精良但稀缺使得宛王視之為「宛寶馬」，遂不惜強拒漢使。

大宛養馬實際情況可與當時號稱產馬和「多馬」的烏孫作一對照。(1) 二使西域結束，烏孫派導譯數十人送張騫歸漢，隨行還進獻數十匹烏孫良馬作為外交回禮，並立即得到武帝青睞而獲名「天馬」。相比之下，漢軍破宛結盟賂遺鎮撫，新立宛王遣子入侍時也僅「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³² (2) 烏孫與漢正式通使後，約元封二年（前 109）遣使聘江都翁主（前 130–前 101）求和親。³³ 這次烏孫使團「以千匹馬聘漢女」，漢史官顯然深感聘馬甚眾，述其事後複記「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³⁴ 學者已指出「四五千匹」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富人」當指烏孫各級貴族、官吏、奴隸主等，從《漢書·西域傳》可知烏孫僅中央一級貴族就有十四人，則馬匹之富不難推想，³⁵ 據此略估，烏孫僅貴族一級保有的馬匹數量就可達五萬餘至七萬餘。又如，張騫再度西使時烏孫政局不穩，昆莫獵驕靡與其次子大祿和其孫軍須靡各為首領，國眾分為三，各將萬餘騎別居。³⁶ 昆莫獵驕靡共十餘子，除三位首領外，十餘子應屬《漢書》所謂「富人」，估可得首領貴族階層至少有馬八萬餘。以上估算亦於史有據，宣帝時因匈奴侵削，烏孫昆彌翁歸靡求漢出兵救公主，上書稱「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³⁷ 後本始二年（前 72）五

32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頁 3895。

33 烏孫千匹馬聘漢女之年可由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於元封三年（一說元封六年秋，不確）上推。三年（前 108）已證，見王明哲、王炳華著：《烏孫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74。使節往還需數月至一歲，故烏孫千匹馬聘或在元封二年（前 109）。

34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50。

35 王明哲、王炳華著：《烏孫研究》，頁 57。

36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47。

37 《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頁 3785。

將軍出擊匈奴，「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³⁸ 遂不妨認為，至昭宣時烏孫上層馬匹可達十萬以上。由上述史料和推算可見，武帝時為聯姻西漢以拒匈奴而一次性挑選出一千匹精良烏孫馬作聘禮，對烏孫這個真正「多馬」的「行國」來講確非難事。反觀漢軍伐宛大勝「恣所取」，即便「中馬以下」者也僅「牡牝三千餘匹」。可見大宛不獨善馬不多，僅普通馬匹的蓄養規模，也實難與「多馬」的烏孫並稱。

文獻的蛛絲馬跡暗示大宛以「多善馬」著稱名不副實，考古研究從物質材料角度亦提供了有力線索。對比烏孫活動的今哈薩克斯坦泛七河流域（Zhetysu）和中國新疆伊犁河上游地區，³⁹ 以及大宛所在的費爾幹納盆地（Ferghana Valley）的考古發現，也似難看出大宛將大規模畜牧馬匹，尤其是大量培育優良馬種，作為其支柱生業模式。



圖 1 漢代西域示意圖（周天宇製圖。底圖採自徐聖謨、程光裕：《中國歷史地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年〕，頁 20。）

38 同上注。

39 烏孫具體的活動範圍，見孟凡人：〈烏孫的活動地域和赤谷城的方位〉，《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頁 32。

中外考古學家在泛七河—伊犁地區（圖 1）發現了一系列游牧族群的古墓和生活遺跡，年代在約公元前二世紀至三世紀，該時段被稱為「烏孫時期」。⁴⁰ 從葬俗、遺物看，這些游牧人共屬一個大的文化範疇且又分屬若干不同的次級文化類型，⁴¹ 這與漢籍「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⁴² 的記載相合。考古資料反映出烏孫治下各族群鮮明的畜牧或稍兼農業的生業模式。其典型特徵之一即該區域墓葬廣泛隨葬牲畜遺骨。例如伊犁河中游右岸年代更早屬於塞人遺存的安多別墓地和別斯沙迪爾墓地，雖遭受盜墓破壞，但都發現了殉馬；⁴³ 伊犁河右岸烏孫早期墓葬中 84% 出土了綿羊骨，至中、後期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十分普遍。⁴⁴ 伊犁河中游左岸 58 處烏孫相關遺跡，其中圖如薩伊遺址出土大量獸骨，羊骨最多，其次鹿骨，馬骨最少，薩雷托加伊墓群出土大量綿羊骨、少量馬骨。⁴⁵ 伊塞克湖東南的 Barskhan 地區亦發現不同時期的馬銜。⁴⁶ 中國新疆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圖 1）約 600 座烏孫時期土墩墓，可分大、中、小三型，特

40 或將伊犁河流域烏孫遺跡的時期上限推至前三世紀，見 K. A. 阿奇舍夫、Г. A. 庫沙耶夫著，孫危譯：《伊犁河流域塞人和烏孫的古代文明》（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21。烏孫大舉西遷伊犁河流域在前 161 年左右的推斷較為適宜，見王明哲、王炳華著：《烏孫研究》，頁 9。

41 劉漢興、孔媛媛：〈中亞七河地區公元前 3 世紀—公元 3 世紀考古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北方文物》2020 年第 5 期，頁 54。

42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頁 3901。

43 K. A. 阿奇舍夫、Г. A. 庫沙耶夫著，孫危譯：《伊犁河流域塞人和烏孫的古代文明》，頁 75。

44 同上注，頁 148。頁 167 章末總結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烏孫墓葬「很少見到綿羊骨」，但書內羅列的 38 座中後期墓葬有 19 座出土綿羊髌骨 / 椎骨，仍佔 50%。

45 肖霄：〈基於考古資料的烏孫赤谷城地理位置再探討〉（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頁 25–27。

46 馬銜年代約前三世紀，伊塞克湖區諸多墓葬城址淹沒於湖水下，遺物的位置、年代、文化屬性判別尚有爭議。見 В. П. Мокрынин, В. М. Плоских, *Иссык-куль: затонувшие города* 伊塞克湖：淹沒之城（Фрунзе: Илим, 1988），92–98, fig20.

克斯河上游地區以大型土墩墓為主，⁴⁷ 如昭蘇附近的墓葬出土相當數量的羊、牛、馬獸骨，⁴⁸ 特克斯河中下游主要為中小型封堆墓，其中 49% 含有陶器—鐵刀—獸骨的隨葬品組合，其中羊骨為大宗，馬骨約佔 26%。⁴⁹ 一些隨葬馬骨的墓葬規模很大，並有金箔片伴出，如昭蘇縣喀拉蘇土墩墓的 M1(封堆直徑 30 米)、M4(封堆直徑 28 米)，均出馬骨、金箔，等級較高。⁵⁰ 有學者認為烏孫時期遊牧社會組織具有明顯的階級分化，特克斯河上游的昭蘇盆地可能是烏孫高級貴族聚居區，甚至可能為王庭所在。⁵¹ 由此可見，西漢時期烏孫墓葬確有不同程度的葬馬習俗，且主要出現於泛七河—伊犁地區東南部的墓群中。尤其是那些可能屬於王族或各階層貴族的高等級墓葬中，中下層平民墓葬少見葬馬現象，而主要以羊入葬。這說明馬和羊在烏孫人生活中確實佔據重要地位，也可反映出他們確以牧馬放羊為生業。且伊犁地區自古是天然馬場，至今仍有伊犁種馬場。

再來看看大宛所在的費爾幹納地區(圖 1)的考古情況。古勒布諾娃(N. G. Gorbunova)《公元前六世紀—六世紀古代費爾幹納的文化》(*The Culture of Ancient Ferghana: VI century B.C. - VI century A.D.*)一書將十九至二十世紀以來在費爾幹納盆地開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系統整理，書中指出，前二世紀至七世紀費爾幹納地區存在一個文化面貌連貫、特徵鮮明的時期，考古學家稱之為庫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期(Kugai-Karabulak culture)，前承艾拉坦—阿克塔姆(Eilatan-Aktam)文化期(前六至前三世紀)，後啟突厥—粟特文化期(七至八世紀)。⁵² 基於陶器的類型，

47 劉露露、孫危：〈特克斯河流域烏孫時期墓葬的定量分析及相關問題研究〉，《西部考古》2021年第1期，頁143。

48 肖霄：〈基於考古資料的烏孫赤谷城地理位置再探討〉，頁11-12。

49 劉露露、孫危：〈特克斯河流域烏孫時期墓葬的定量分析及相關問題研究〉，頁146-147，表四。

50 伊犁州文管所：〈昭蘇縣喀拉蘇墓葬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頁31-34。

51 劉露露、孫危：〈特克斯河流域烏孫時期墓葬的定量分析及相關問題研究〉，頁153。

52 N.G. Gorbunova, *The Culture of Ancient Ferghana: VI Century B.C. - VI Century A.D.*, trans. A. P. Andryushkin (Oxford: B.A.R., 1986), 3-4, 209.

庫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期又可分早段（前二至一世紀）、中段（一至四世紀）和晚段（四至七世紀），⁵³ 早段可與西漢一朝相呼應。這一階段為我們熟知的遺跡有明鐵佩遺址（Ming-Tepe site），2012–2017 年中烏聯合考古項目對其進行了系統的勘探與發掘。有學者將明鐵佩與漢時「貳師城」對應，⁵⁴ 但該說尚有爭議。⁵⁵

有學者已注意到庫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期「無論是遺址還是墓葬中均沒有出現馬骨。這與《史記》、《漢書》等我國史籍中所記載的『〔大宛〕多善馬』不相吻合」，⁵⁶ 這一判斷不誤，稍需補充若干細節。總覽費爾幹納盆地早期遺存，庫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期的早段確實尚未見馬骨，中段和晚段近 90 處遺址中也僅 7 處發現羊、牛、驢、馬、豬、狗等獸骨，7 處中馬骨又僅佔 4%–16%（只晚期 1 處佔 20%），且這些獸骨數量甚少以至於不足以判斷墓主人群的生業模式和畜牧構成。⁵⁷ 因而，至少西漢時期的費爾幹納盆地馬骨材料看不出大宛有大規模蓄養馬匹的跡象，亦難證明當時這裡有很發達的養馬業。值得一提的是，庫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期早段，其他有關馬匹的材料僅見兩處圖像，即費爾幹納盆地東南部阿拉萬（Aravan）河谷岩畫（圖 2），以及奧什（Osh）市西北 8 千米的艾雷馬曲套（Arymactau）岩畫（圖 3）。從造型風格來看，馬頭小而高昂，兩耳尖聳，馬頸、馬腿細而修長，均表現出同種高頭駿馬的形態，與史料中宛善馬形象極似。雖然岩畫年代很難確定，但兩處材料尤其是艾雷馬曲套岩畫的馬匹圖像被早期學者看作是漢籍「大宛天馬」的寫照，該處岩畫描繪了 34 隻動物，其中馬恰好

53 Ibid., 72, 175.

54 朱岩石等：〈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州明鐵佩城址考古勘探與發掘〉，《考古》2017 年第 9 期，頁 24。

55 艾力江等：〈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明鐵佩古城遺址考古工作綜述〉，《考古學集刊》第二十集（2017 年），頁 228。或認為「貳師」並非一城之名，見第四節。漢籍所載大宛地名「貳師」、「郁成」、「貴山」的地望比定學說頗多，均未有定論，學者對幾種假說已有全面綜述，見林鈴梅：〈中亞費爾幹納盆地考古綜述〉，《考古與文物》2024 年第 8 期，頁 79。因不涉及本文論證與核心觀點，故不贅述。

56 孫危：〈大宛考古學文化初探〉，《考古與文物》2004 年第 4 期，頁 55。

57 N.G. Gorbunova, *The Culture of Ancient Ferghana: VI Century B.C. – VI Century A.D.*, 178–79, table of osteological material.

30 匹，⁵⁸ 與漢軍擄取「三十匹」之數應屬巧合。對於「大宛多馬」而費爾幹納馬骨罕見的現象，孫危認為「大宛是一個以灌溉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的國家……馬則不過是其作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貿易中心所經營的一種商品而已，大宛本身的特產並不是養馬」且「在當時來自大宛的東西並不一定產於大宛」，雖未進一步論證，但這一推斷頗為重要。⁵⁹

總之，西漢史料中烏孫人「行國，隨畜逐水草」且「富人多馬」之記載所反映的畜馬牧羊為主的生業模式，確實可在考古發現中得到呼應。而大宛的「多善馬」卻難以獲得考古資料的支撐。當然考古遺物不見馬骨並不能直接說明大宛不養馬，但與烏孫考古資料相比，我們或許可以說，很難看出大宛有大規模畜牧馬匹，尤其是培育善馬／天馬種的生業模式。



圖 2 阿拉萬河谷岩畫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2.5: 128



圖 3 艾雷馬曲套岩畫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2.5: 127

三、「撲挑」之地與「蒲梢」之駿

上文已說明後被冠名「天馬」而備受推崇的「善馬」在大宛數

58 Ю.А.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Лошадей В Урочище Айрымачтау” 艾雷馬曲套山谷馬的岩畫圖像,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2.5: 126–28. 特此感謝林鈴梅女史惠賜俄文資料。

59 孫危：〈大宛考古學文化初探〉，頁 55。

量有限，進而可推斷它們並非大宛本土歷來繁衍生息的特產，也非大宛國人賴以為生、大量牧養的常畜。那麼它們更可能是從其他地區引進後，僅在大宛本地存蓄「待售」的「舶來品」。緊俏的「進口馬」一部分提供給「弓矛騎射」的本國騎兵，剩下的作為重要商品與鄰國進行中轉貿易。那麼打著「大宛」招牌的進口善馬又出自何地？

《史記·樂書》載「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⁶⁰ 武帝大悅而作《天馬歌》。但「蒲梢」二字歷來注家少有深究，多視其為不具實義的馬名，近人以比較語言學考其含義，深有見地。⁶¹ 本文試作另解，以期方家教正：「蒲梢」即「撲挑」，皆為地名，均指古波斯帝國安息王朝發跡之地——帕提亞。

「蒲梢」，司馬貞《史記索隱》：「梢，音史交反，又本作『騷』，亦同音。」⁶² 「蒲梢 / 騷」是西域語言某詞在西漢時期的漢字對音轉寫無疑。

「撲挑」見《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言其方位「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軒、條支接。」⁶³ 關於犁軒、條支、罽賓、烏弋山離的地望，前人諸說豐碩，⁶⁴

60 《史記》，卷二四，〈樂書〉，頁 1401。

61 如芮傳明認為其源自古突厥語 *bozat*，意為「毛色淺淡的馬」或「灰馬」，見芮傳明著：《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49–153；又如羅新認為其「似乎是一個以 *asp / sp*（蒲）前置、毛色修飾詞（梢 / 騷）後置的硬譯，多少反映了大宛馬名的本來形態」，見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像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 年），頁 216。

62 見《史記》，卷二四，〈樂書〉，頁 1401。「梢」後世或作「捎」、「稍」。《廣韻》：「蒲捎良馬名也」，見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152。

63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頁 3888。

64 「黎軒」、「條支」地望諸說，見龔纓晏：〈20 世紀黎軒、條支和大秦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 年第 8 期，頁 19–28；張緒山：〈百餘年來黎軒、大秦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 年第 3 期，頁 11–19；「罽賓」地望諸說，見余太山：〈罽賓考〉，《西域研究》1992 年第 1 期，頁 46 及腳注 1–3。「烏弋山離」見余太山：〈安息與烏弋山離考〉，《敦煌學輯刊》1991 年第 2 期，頁 84。

而「撲挑」之地⁶⁵考述缺疑。前人多將其與《後漢書·西域傳》之「濮達」對應，認為指巴克特里亞（Bactria）地區。但該說未安之處在於，自張騫身至大夏以來，漢史官已知其國其地，且本傳「大月氏」條下又明載大夏，雖《漢書·西域傳》成書時其地已臣屬大月氏，但「大夏」沿革史實文辭清晰，漢史官顯然不會在同傳中將「大夏」與「撲挑」二名混淆為一地，巴克特里亞對應於「大夏」目前已被廣泛接受，二者應指不同地點。按本條所涉幾個地理單元的相對位置，即帕米爾—興都庫什山（罽賓）以西，地中海—兩河—伊朗高原（黎軒、條支）以東，伊朗阿拉霍西亞（Arakhosia）—德蘭吉安那（Drangiana）（烏弋山離）等地以北的地理單元正是西史傳統所稱之帕提亞（Parthia）地區。另，本傳亦有「安息國」專條，帕提亞（撲挑）地屬安息，但此二名並見於同傳並無衝突且於史有據，因從懸泉漢簡不屬都護的西域諸國記錄看，來自中亞大國和其羈屬小國的使者常以各自獨立的身分和地（國）名並載於西漢邊塞記錄中。⁶⁶

Parthia 之名的溯源、轉寫和地望比定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John Sheldon 通過梳理認為：除早期巴比倫材料外，最典型的銘文記錄來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琉士貝希斯敦（Behistun / Bisotun）銘文，以古波斯語楔形文字的四個字母銘勒，轉寫為「prθw」。其後希羅多德（Herodotus）《歷史》中希臘文寫作 Πάρθοι；之後斯特拉波（Strabo）和阿里安（Arrian）將該地名寫作 Παρθυαία，其地之民寫作 Παρθυαῖοι；波利比烏斯（Polybius）又將地名與人民兩詞記作 Παρθυαία 和 Παρθυήνη。而「prθw」中「w」這一音素卻出現在所有伊朗語來源的材料

65 「撲挑」漢以後鮮有見載，後多作「桃」，如《通典·邊防八》作「撲桃」，見李錦繡、余太山著：《〈通典〉西域文獻要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54；《五音集韻·屋》：「撲，撲桃，西域地名」，見韓道昭：《校訂五音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89。

66 如 II90DXT0216 ② :877-883 中康居王使者與羈屬康居的小王蘇雍使者並列記錄，見郝樹聲、張德芳著：《懸泉漢簡研究》，頁197。

中。⁶⁷ 因而 Sheldon 認為，拉丁化後的 Parthia / Parthian 事實上來自於希羅多德以降的有偏差的希臘語記音，而更確切的轉寫應為 Parthawa / Parthaw(an)，⁶⁸ 或 Parθaw。⁶⁹ 這種轉寫更接近於伊朗語帕提亞地區方言或即帕提亞語 (Parthian)⁷⁰ 本身的發音。Sheldon 結合希羅多德所列的 16 波斯行省 (Satrapies) 位置，以及後繼史料，比定帕提亞地望「恰位於西北希爾卡尼亞 (Hyrcania)、北方花刺子模 (Chorasmia)、東北粟特 (Sogdia)、東方巴克特里亞 (Bactria)、東南阿里亞 (Aria)，以及南方卡爾曼尼亞 (Carmania) 之間，即裡海 (Caspian Sea) 的正東南方」。⁷¹ 與《漢書》地望亦相契合。

此外，另一個語音線索來自於原始粟特語。1996 年至二十一世紀初，哈薩克斯坦南部阿雷斯河 (Arys) 河流域的庫勒塔佩 (Kultobe) 遺址披露了一批重要考古資料，推進了粟特語研究的進展。遺址出土了 17 件有銘文的烘乾泥磚，據語言學家的考釋，銘文的一些獨有特徵表明，它是以一種更古老的形式書寫的粟特語，推測時代下限為公元二世紀，被稱為原始粟特語 (proto-Sogdian)。

67 C. Bartholomae, *Altiranisches Wörterbuch* (Strassburg: Walter de Gruyter, 1904), 869; C. Bartholomae, *Zum Altiranischen Wörterbuch Nacharbeiten und Vorarbeiten* (Strassburg: Walter de Gruyter, 1906), 190; F.C. Andreas, W.B. Henning, *Mitteliranische Manichaica aus Chinesisch Turkestan II* (Berlin: Verla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3), 303; A. Ghilain, *Essai sur la Langue Parthe – son système verbal d'après les textes Manichéens du Turkestan Oriental*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1939), 36 and note 17; W. Sundermann,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Berlin: Berliner Turfantexte, 1981), 39. 轉引自 John Sheldon,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Parthia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Asian Ethnicity* 23.8 (2006): 5–17.

68 John Sheldon,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Parthia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6.

69 該轉寫來自帕提亞語阿拉米文自名。出處未詳。見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rthia>，檢視日期：2022 年 4 月 20 日。

70 該語是帕提亞語或屬伊朗語帕提亞方言，定義尚存爭議，Sheldon 認為其作為類似拉丁語的宗教經典用語，綿延使用至少四世紀之久，其地位和重要性被低估。見 John Sheldon,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Parthia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15.

71 John Sheldon,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Parthia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5–6.

銘文中「θ」音素正以阿拉米字母記作 tau<t>。⁷²

若以上推測成立，漢籍中的「蒲梢 / 騷」、「撲挑」可能來自帕提亞語詞 Parthaw(an)，或其原始粟特語發音。學界共識帕提亞安息帝國時期帕提亞語相關的一手材料較為稀見，⁷³ 除極少量希臘文帕提亞語石刻、錢幣，主要為土庫曼斯坦尼薩古城出土的前一世紀關於葡萄酒運輸的有字陶片 (ostraca)。⁷⁴ 若「蒲梢」、「撲挑」確為「帕提亞」或其相關概念之上古音對音，不失為給帕提亞史補充兩條來自古代中國的歷史記錄。

《漢書·西域傳》回溯武帝經略西域後各地品類輸入中原的景觀：

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部)[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圍。⁷⁵

其中域外輸入中原並備受推崇的良馬，以不同的品評方式被賦予不同名號。「龍文」即「龍紋」，很可能指具有某種特殊毛色的馬匹。

72 N. Sims-Williams, "The Rediscovery of Sogdian," in *Byzantium to China: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on the Silk Road*, ed. G.B. Mikkelsen (Leiden: Brill, 2022), 492–93. 另外，現存於帕米爾澤拉夫善河 (Zeravshan) 流域的雅格諾比語 (Yagnobi) 被認為繼承了中古伊朗粟特語，在該語言的一支方言中「θ」發 [s] 音，另一支方言中發 [t] 音，這有可能暗示了「蒲梢 [s]」與「撲挑 [t]」的關係。見 Antje Wendtland, "The Position of the Pamir Languages within East Iranian," *Orientalia Suecana* 58 (2009): 173, 176.

73 西方文獻承襲古希臘史料傳統，習慣上稱波斯帕提亞帝國。而希臘化塞琉古帝國覆滅後，發跡自帕提亞的該朝歷代君主均以其締造者 Arshk / Arsacid (安息) 為王號，比照「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則可稱「帕提亞安息帝國」。

74 見網址：<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arthian-language>，檢視日期：2022年4月20日。

75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頁3928。

「魚目」應指此類馬匹有特殊的眼部形態。⁷⁶「汗血」自然是指張騫首次西使在大宛所見之「馬汗血，其先天馬子」。⁷⁷「蒲梢」作為西域語言中帕提亞的上古漢語對音，可能是大宛國人以產地稱馬，又或是漢軍擇取善馬時得知產地而命名。《漢舊儀》：「中黃門駙馬大宛馬、案：「馬」字從《文選·赭白馬賦》注引補。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果下馬，高三尺，駕輦。大宛、汗血馬皆高七尺。乾河馬，華山神馬種也。」⁷⁸其將黃門所管理的大宛馬、汗血馬、天馬並稱，應非由於混淆，而是諸稱各有所指。天馬應指貳師將軍所獲三十匹善馬一脈；大宛馬即以地名相稱，應指貳師帶回的「中馬以下者」之種，乾河馬也應是地名。且漢地本有以地望為號之制，如所謂「貳師將軍」。故〈樂書〉與〈西域傳〉中之「蒲梢」馬名出自地名亦屬類似習慣。後世唐李商隱〈茂陵〉詩有「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或許唐時尚存「蒲梢」的地名含義。

四、尼薩之馬與傳統產地

前輩學者考證大宛史地，尤其關於貳師城地望時，已推測過大宛貳師馬的來歷。白鳥庫吉（Shiratori Kurakichi）提出，據阿拉伯史料，在費爾幹納之藥殺水（Jaxartes）以南有「Nisā」、「Nisaya」

76 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帛書〈相馬經〉經考釋定名為〈大光破章故訓傳〉，全篇五千二百餘字均為相馬眼部各處的內容，可見自戰國至西漢流傳的相馬術中，眼睛是極受重視的部位。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第8期，頁17；趙達夫：〈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江漢考古》1989年第3期，頁47；張傳官：〈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校讀札記〉，《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2018年），頁360-379。

77 「汗血」並非特定優良馬種的獨有性狀，一說認為該種馬匹毛色淺，奔馳出汗則毛色變深似血；一說認為源於寄生蟲 *Parafilaria multipapillosa* 寄生於馬肩膊處令血管擴張，創口出血，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頁81，轉引自于景讓：〈汗血馬與苜蓿〉，《大陸雜誌》1952年五卷九期，頁24-25。後說甚合於《東觀漢記》、《後漢書》「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之語。該寄生蟲病常發於夏季，對馬匹健康影響較小，常流行於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地，見網址：<https://gelmintoz.net/gelmintozy/filyariatozy.html>，檢視日期：2022年4月23日。

78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79。

或「Nisāyah」的地名，貳師城一名必係「Nisā」的對音，因「貳」漢藏語系古音有「ni」之音，後起才出現「dji」和「erh」音。並徵引斯特拉波、普林尼（Plinius）、托勒密（Ptolemy）之記述，指出「Nisa」、「Nisāa」、「Nisaya」一類地名還散布於起自西南米底（Media）經呼羅珊（Khorassen），東北到費爾幹納的廣泛地帶。他推測此名源於米底的Nisea地區，該地以產良馬著稱，故出產該種名馬之地亦冠以尼薩之名。⁷⁹ 米底名為尼薩之地的記錄其實已見於貝希斯敦銘文，其載大琉士一世（Darius the Great）誅穆護高墨達（Gaumata the Magus）即在米底的尼塞亞（Nisaya）。⁸⁰ 若白鳥氏之論可從，或可認為「貳師」一詞並非僅大宛某一城池之名。

希羅多德《歷史》三次提到尼薩的馬匹，稱作涅賽昂馬（Nesaeon horse）。一為三卷106章簡短提及「印度的馬比米底人飼養的馬即所謂涅賽昂馬要小些」；⁸¹ 二為七卷40章，詳述薛西斯（約前519–前465，前486–前465在位）親征希臘前，離開呂底亞薩迪斯城時大軍行進的場面，其中提到各軍士「方陣」過後，

是10匹裝飾得極其華美的涅賽昂種聖馬；這些馬之所以被稱為涅賽昂馬，是因為在米底有一片名叫涅賽昂的大草原，而這些高大的駿馬就是在那裡飼養起來的。在這10匹駿馬之後，是由8匹白馬拉曳的宙斯神聖戰車，馭者徒步隨於馬後，手執韁繩。原來，任何凡人均不得乘坐此戰車。薛西斯本人位於槍兵之後，乘坐在由涅賽昂馬拉曳的戰車上。⁸²

79 白鳥庫吉著，王古魯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頁197–200。岑仲勉、方豪、余太山亦認同此說。參見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0，注36；方豪：《中西交通史》，頁81；余太山：〈大宛和康居綜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頁23。

80 David Asheri, et al.,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 – IV*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30.

81 希羅多德著，徐松岩譯注：《歷史（詳注修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356。

82 同上注，頁655–656。

譯者注：希羅多德所言「宙斯神聖戰車」實為波斯瑣羅亞斯德教最高神奧爾穆茲德（Ormuzd）神車；三為九卷 20 章，普拉提亞戰役（Battle of Plataea）之前，波斯將領瑪西斯提烏斯（Marsistius）的「坐騎是一匹涅賽昂駿馬，這匹馬佩戴著黃金轡勒，而且其他的方面也裝飾得格外豪華」。⁸³ 這些文字均描述尼薩馬體型高大俊美，後兩處尤反映出產自尼薩草原的良駿受到波斯人極度推崇，作為最高貴的坐騎被視為神明和帝王的象徵。尼薩草原多駿馬也在阿里安《亞歷山大遠征記》有提及，其載亞歷山大東征途中看到了「放牧御馬的平原大牧場，這片平原叫奈薩平原，這些馬叫奈薩馬。這都是歷史家希羅多德說的。御馬總數原來有十五萬匹以上。但亞歷山大看到時已不足五萬。據說大部分已被盜匪搶走。」⁸⁴

那麼產自米底之尼薩平原的駿馬與上文得自大宛名曰「蒲梢」的馬匹是否確有關係？斯特拉波《地理學》的記載提供了重要線索，第十三章〈米底〉：

這裡和亞美尼亞都是少有的、優良的「牧馬場」；有一些草地被稱為「牧馬場」，有人從波斯和巴比倫前往裡海門要經過那裡。據說在波斯人統治時期，那裡放牧了 50000 匹母馬，這些馬匹都是屬於波斯國王的。至於國王使用的尼薩馬，它們是最好和最高大的馬匹。有些作家認為種馬出自這裡，另外一些作家則認為出自亞美尼亞。它們現在叫做帕提亞馬（Parthian horses）。⁸⁵ 它們和希臘的、我國的馬匹相比，特點是體態不同。⁸⁶

83 同上注，頁 837。

84 阿里安著，E. 伊利夫·羅布遜英譯，李活譯：《亞歷山大遠征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270。

85 英文譯文引自塔夫茨大學古典學系珀耳修斯數字圖書館（Perseus Digital Library），見網址：<http://data.perseus.org/citations/urn:cts:greekLit:tlg0099.tlg001.perseus-eng2:11.13.7>，檢視日期：2024 年 12 月 29 日。

86 斯特拉波著，李鐵匠譯：《地理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頁 779-780。

斯特拉波遊歷著述的時代（前一世紀至一世紀上半葉）離武帝時張騫出使、李廣利伐宛的時代（前二世紀下半葉至一世紀初）相去未遠，或許可以說明張騫出使至斯特拉波著述的時期，「帕提亞馬」的名號已廣泛流行於東達費爾幹納盆地的中亞地區，並以「蒲梢」之名為漢地所知。

上述材料說明，裡海西南至東南沿岸，在古典時代一直是著名的牧馬場且盛產品種優良的高頭駿馬。有學者認為古典作家已知尼薩馬品種（Nesaeon breed），文獻中的亞美尼亞馬繁育自尼薩馬，比賽遠超希臘馬的波斯馬，以及一至二世紀影響歐洲的阿蘭馬（Alanian horses）均出自尼薩馬這個獨特馬種，可統稱為東方馬（Oriental horses）。⁸⁷ 亦有學者指出大宛汗血馬的具體產地是今土庫曼斯坦境內科佩特山脈（Kopet-Dag）和卡拉庫姆（Karakum）沙漠之間的阿哈爾（Akhhal）綠洲，這裡已有三千年馬匹馴養史，現今仍馳名世界的阿哈爾—捷金馬（Akhhal-Teke horse）被認為是古代汗血馬的後裔，作為土庫曼斯坦國寶出現在該國國徽上。⁸⁸ 雖米底尼薩大草原的具體位置和範圍尚無定論，但我們仍可認為聲名遠播西漢的「大宛善馬」應來自早已聞名中亞的尼薩馬種，時稱「帕提亞馬」，其產地正是傳統產馬區裡海南岸的米底—帕提亞地區（且當時該地已在安息帕提亞治下），故史載「馬名蒲梢」。

五、重商之國與地緣平衡

對大宛國情最詳實的記載見於《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其中武帝時對大宛的認識應是征和三年（前 90）之前西

87 V.B. Kovalevskaya, "Ancestors of the Oriental Horse in Eurasia: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48 (2020): 136–38.

88 林梅村：〈西域之貢：漢代皇家藝術中的汗血馬〉，《紫禁城》2014 年第 10 期，頁 73。

漢掌握的並不完善的西域信息。⁸⁹ 對比當時大宛及其旁國的信息，可見一些共性和差異：

表 1 「土著 / 行國」表

國名	「土著 / 行國」	軍事	商業	城
匈奴	其俗竟則隨畜（〈匈奴列傳〉）	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列傳〉）		
烏孫	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	控弦者數萬，敢戰		
大月氏	行國，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	控弦者一、二十萬		
康居	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		
奄蔡	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		
大宛	土著，耕田，田稻麥，葡萄酒	其兵攻矛騎射	善市賈，爭分銖	大小七十餘城
安息	土著，耕田，田稻麥，葡萄酒。城邑如大宛	王令將二萬騎	有市，民商賈	大小數百城
大夏	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	兵弱，畏戰	善賈市。有市	有城屋
身毒	土著，大與大夏同	乘象以戰	往市之身毒	

可以看出，在張騫以降的漢使的認知與經驗中，上述諸國大略可分行國與土著兩類。行國即隨畜逐水草、以遊牧為主之國，土著之國多業田作有城屋。這也與泛七河—伊犁地區與費爾幹納盆地城址考古資料吻合，烏孫遺跡雖顯示出山前灌溉農業跡象但仍以畜牧業為主，⁹⁰ 且大量陶器—鐵刀—獸骨的隨葬組合正反映牧人的飲食習

89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史記》之最晚記事為征和三年李廣利降匈奴。見王國維：《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58。又學者考證《漢書·西域傳》中各國戶口資料積累整理自不同時期，綜合來講，戶口繫年上限在西域都護設置即宣帝神爵三年（前59）。見袁延勝：〈《漢書·西域傳》戶口資料繫年蠡測〉，《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頁106。故西漢對大宛國情資料的認知在武帝時期還不詳細。

90 劉漢興、孔媛媛：〈中亞七河地區公元前3世紀—公元3世紀考古遺存的發現與研究〉，頁54。

價；⁹¹ 大宛庫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期則有豐富的農業遺存：大麥（barley）佔最大比重，其次小麥（wheat），還有黍（millet），亦於 Munchak-tepe 發現了稻（unscoured rice）。除糧食作物還發現豆類（leguminous）及後來引入中原的苜蓿（lucerne）。⁹²

值得注意的是，土著之國大多「有市」且民「善市賈」。雖史料「大宛」本條未特注明「市、賈」，但張騫初訪時：

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鬣，善市賈，爭分銖。⁹³

這些記述反映出大宛與上表 1 土著國家相似，除了是農耕城市國家外，其實更有重商業性質，雖兼有小規模牧業，飼養普通馬匹供「騎射」之用，但與其周鄰的諸行國將畜牧作為賴以生存的支柱性生業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因而可以推想，也許是由於從帕提亞到大宛距離尚遠，也許是由於兩地間貨運還需經手他國，大宛引進的尼薩種善馬數量很有限，其在重商的大宛看來是與鄰國中轉貿易的重要且稀有的商品。其標榜「多善馬」、「天馬子」又「匿不肯出」，是否是大宛善馬貿易「居奇貨，昂其值」的商業手段，惜史料闕如。

另一方面，史料的細節又暗示大宛與鄰國的關係值得玩味。

與康居：張騫抵大宛表明目的地為大月氏，宛王「為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又貳師將軍後伐大宛「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彘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漢軍後圍困宛城兵臨城下，大宛亦求救於康居，然漢兵甚盛，康居只是候

91 劉露露、孫危：〈特克斯河流域烏孫時期墓葬的定量分析及相關問題研究〉，頁 152。

92 N.G. Gorbunova, *The Culture of Ancient Ferghana: VI Century B.C. – VI Century A.D.*, 175–76.

93 散見於《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34、3844、3852。

視漢兵。大宛與康居或有盟邦或羈縻關係。⁹⁴

與大月氏：「〔月氏〕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月氏被匈奴、烏孫兩次擊敗西遁，先抵大宛卻並未佔領這裡，且「過宛」二字似暗示當時月氏未與大宛發生軍事衝突，而是較平穩「經過」後南下，隨即擊潰大夏領有其地設立王庭。可見月氏本有軍事實力但並未攻滅大宛。⁹⁵

與烏孫：「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又李廣利二次出征，武帝遣使敕命烏孫發兵助漢擊大宛，而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⁹⁶

與匈奴：史料頻現烏孫、月氏、乃至西漢均備受匈奴侵襲，卻未見載大宛與匈奴衝突。零星線索有「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⁹⁷「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⁹⁸

從「大宛在匈奴西南……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百里」⁹⁹及前表 1 可見，大宛的地理位置被行國包圍「環伺」（圖 1），只有東部孔道與塔里木盆地綠洲小國連通，進而接河西走廊與漢地。被認為「兵弱」的「土著」大宛與其「控弦」數萬的鄰邦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地緣政治平衡。如上文，大宛實為一重商的主務農耕稍兼畜牧的城邦國家，會評估各國軍事力量，通過匯聚各地特產控制一定資源，與鄰邦進行中轉貿易，獲得經濟利益進而維持地緣政治關係。或許正因此，大宛屢次對漢使「匿善馬」，且不遠萬里千金請宛馬時，宛王及貴人以其一貫的地緣外交和資源平衡考慮，首先判定漢地絕遠，軍事風險小，放言「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¹⁰⁰「舶來品」善馬數量稀少，中轉貿易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亦是平衡諸國關係之工

94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34–3835、3855–3856。

95 同上注，頁 3838。

96 同上注，頁 3848–3856。

97 《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頁 3877。

98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頁 3523。

99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 3836–3838。

100 同上注，頁 3852。

具，故大宛不會同意如此重要資源被漢廷一方大量索取，更不允許被悉數壟斷。

結語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將漢宛之戰的前因後果更清晰且符合歷史邏輯地梳理和復原：「宛善馬」原產地並非大宛（費爾幹納盆地）本土，而是安息帝國東境的米底—帕提亞地區，該地以「蒲梢」（西漢）或「撲挑」（東漢）之名見載於漢籍，其地亦為古典時代西亞、中亞大國的傳統良馬產區。重商且主務農耕稍兼畜牧的土著之國大宛，從帕提亞引進良種馬，作為與周邊遊牧行國中轉貿易的重要資源。進口的帕提亞良馬數量有限而珍貴，除用以獲取經濟利益，更充當了大宛平衡與鄰國地緣政治和外交關係的槓桿。也正因此，漢使屢屢因大宛隱匿而求善馬不得。直至武帝重金請馬遭拒引發宮廷外交衝突，繼而漢使被殺這一重大漢宛外交事件的發生，點燃了伐宛的導火索。而最終貳師將軍歷四歲，捐巨師，靡億費歸漢，僅帶回三十匹大宛善馬，實則於史必然。進而或可以認為，抵達大宛的漢使由於某些原因，並未認識到大宛善馬乃從外部進口且數量很少的實情，歸漢後向武帝上奏了不切實際的信息。武帝以富庶的農耕帝國君主的心態，和賞賜賂遺鎮撫的外交模式，想當然地以為用千金及金馬交換，即可得到大宛的「特產」。然而大宛則是以平衡地緣關係、保護轉貿資源和計算商業利益的邏輯對待來訪漢使的要求。這場載入史冊的戰爭源於農耕帝國文明思維與重商邦國文明思維之間的差異與衝突。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 K. A. 阿奇舍夫、Г. A. 庫沙耶夫著，孫危譯：《伊犁河流域塞人和烏孫的古代文明》。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
- 于景讓：〈汗血馬與苜蓿〉。《大陸雜誌》1952年五卷九期，頁24–25。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王明哲、王炳華著：《烏孫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 王國維：《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永田英正（Nagata Hidemasa）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簡牘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懸泉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23年。
-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懸泉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 白鳥庫吉（Shiratori Kurakichi）著，王古魯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
- 伊犁州文管所：〈昭蘇縣喀拉蘇墓葬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頁31–37。
- 朱岩石等：〈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州明鐵佩城址考古勘探與發掘〉。《考古》2017年第9期，頁22–38。

- 艾力江等：〈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明鐵佩古城遺址考古工作綜述〉。
《考古學集刊》第二十集（2017年），頁224–231。
- 余太山：〈大宛和康居綜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頁
17–45。
- ：〈安息與烏弋山離考〉。《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頁
82–90。
- ：〈罽賓考〉。《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頁46–61。
- ：《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希羅多德（Herodotus）著，徐松岩譯注：《歷史（詳注修訂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 李錦繡、余太山著：《〈通典〉西域文獻要注》。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年。
- 肖霄：〈基於考古資料的烏孫赤谷城地理位置再探討〉。鄭州：鄭州
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 邢義田：〈漢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檢討〉。《食貨月刊》第2卷第9
期（1972年），頁31–35。
- 孟凡人：〈烏孫的活動地域和赤谷城的方位〉。《西北師大學報（社
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頁31–35。
- 松田壽男（Matsuda Hisao）著，陳俊謀譯：《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
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
- 林鈴梅：〈中亞費爾幹納盆地考古綜述〉。《考古與文物》2024年第
8期，頁79。
- 林梅村：〈西域之貢：漢代皇家藝術中的汗血馬〉。《紫禁城》2014
年第10期，頁70–79。
-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芮傳明著：《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阿里安 (Arrian) 著，E. 伊利夫·羅布遜英譯，李活譯：《亞歷山大遠征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
- 胡岩濤：〈論漢武帝征討大宛國的緣由與影響〉。《秦漢研究》第 9 輯 (2015 年)，頁 283–294。
- 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收入氏著：《夏鼐文集》，中冊，頁 92–1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 孫危：〈大宛考古學文化初探〉。《考古與文物》2004 年第 4 期，頁 48–59。
-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 徐聖謨、程光裕：《中國歷史地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 年。
-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 荀悅、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 袁延勝：〈《漢書·西域傳》戶口資料繫年蠡測〉。《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3 期，頁 104–107。
- 郝樹聲、張德芳著：《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 年。
- 郝樹聲：〈淺論李廣利伐大宛的功過是非〉。《甘肅社會科學》2002 年第 4 期，頁 98–100。
- ：〈漢河西四郡設置年代考辨(續)〉。《開發研究》1997 年第 3 期，頁 59–63。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 年第 8 期，頁 17–22。
- 高榮：〈論漢武帝「圖制匈奴」戰略與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 年第 2 期，頁 108。
- 張傳官：〈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校讀札記〉。《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 (2018 年)，頁 360–379。
- 張維華：《漢史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0 年。
- 張緒山：〈百餘年來黎軒、大秦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

2005 年第 3 期，頁 11–19。

斯特拉波 (Strabo) 著，李鐵匠譯：《地理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

趙達夫：〈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江漢考古》1989 年第 3 期，頁 48–51。

劉漢興、孔媛媛：〈中亞七河地區公元前 3 世紀—公元 3 世紀考古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北方文物》2020 年第 5 期，頁 45–55。

劉露露、孫危：〈特克斯河流域烏孫時期墓葬的定量分析及相關問題研究〉。《西部考古》2021 年第 1 期，頁 143–154。

韓道昭：《校訂五音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像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 年。

龔纓晏：〈20 世紀黎軒、條支和大秦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 年第 8 期，頁 19–28。

外文書目

Andreas, F.C., and W.B. Henning. *Mitteliranische Manichaica aus Chinesisch Turkestan II*. Berlin: Verla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3.

Asheri, David, et al.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 – IV*.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artholomae, C. *Altiranisches Wörterbuch*. Strassburg: Walter de Gruyter, 1904.

———. *Zum Altiranischen Wörterbuch Nacharbeiten und Vorarbeiten*. Strassburg: Walter de Gruyter, 1906.

Di Cosmo, 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Ghilain, A. *Essai sur la Langue Parthe – son système verbal d’après les textes Manichéens du Turkestan Oriental*.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1939.

Gorbunova, N.G. *The Culture of Ancient Ferghana: VI Century B.C. – VI Century A.D.*. Translated by A. P. Andryushkin. Oxford: B.A.R., 1986.

Kovalevskaya, V.B. “Ancestors of the Oriental Horse in Eurasia: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48 (2020): 129–39.

- Мокрынин, В.П., and В.М. Плоских. *Иссык-куль: затонувшие города*. Фрунзе: Илим, 1988.
- Sheldon, John.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Parthia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Central Asia.” *Asian Ethnicity* 23.8 (2006): 5–17.
- Sims–Williams, N. “The Rediscovery of Sogdian.” In *Byzantium to China: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on the Silk Road*. Edited by G.B. Mikkelsen, 483–97. Leiden: Brill, 2022.
- Sundermann, W.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Berlin: Berliner Turfantexte, 1981.
- Waley, A. “The Heavenly Horses of Ferghana.” *History Today* 5.2 (1955): 95–103.
- Wendtland, Antje. “The Position of the Pamir Languages within East Iranian.” *Orientalia Suecana* 58 (2009): 172–88.
-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 Ю.А..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Лошадей В Урочище Айрымачтау.”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2.5: 125–28.

“Heavenly Horses from Pushao”: A Re-evaluation of the Sino–Ferghana Wars

ZHOU Tianyu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tudie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The causes and impact of the two wars fought between the Western Han Empire and the state of Dayuan in the Ferghana valley in 104 and 102 BCE remain inadequately addressed in scholarship. The immediate trigger for the war was the subsequent killing of the Han envoys after a diplomatic dispute over Dayuan’s refusal of selling thoroughbred steeds to the Han. The result of the wars in which the Han acquired only 30 thoroughbred horses incurred intense criticism. This article, drawing from historical source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rgues that Dayuan’s refusal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o-called “(*Da*)yuan *shanma* 宛善馬 (Ferghana thoroughbred horses)” were not indigenous to Dayuan but imported in limited quantities from Parthia. As a sedentary commercial hub, Dayuan leveraged these horses as commodities for trade with neighbouring states, using their export not only for economic gain but also as a tool in geopolitical diplomacy. For this reason,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Dayuan to allow its valuable, imported thoroughbred steed resources to be depleted by the Han court. The article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original provenance of these “Ferghana thoroughbred horses” was most likely the Median–Parthian area. The terms *pushao* 蒲梢 and *putiao* 撲挑 found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thus likely ar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the Parthian or proto-Sogdian toponym *Parθaw(an)*, referring to “Parthia”.

Keywords: heavenly horses, Dayuan (Ferghana), *pushao*, *putiao*, Parthia